

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成立



近日,一批游客在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旧址参观。杨友明 摄

1933年3月13日是一个值得永载党校史册的日子。为了广泛地、有系统地传播马克思主义,同时也是适应革命和战争的需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去武装革命干部的头脑,大批地训练工农干部,中共中央局集中了中央苏区的党、团、政府、工会的力量,于此日创办了一个大规模的苏维埃党校——中央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校址开始在瑞金叶坪洋溪村,很快迁至瑞金沙洲坝大埠村黄竹堪下,最后迁至云石山田心村。2011年5月22日,中共中央批复同意将1933年3月13日确定为中央党校建校日,将3月13日作为校庆日,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被正式确认为中共中央党校的前身。

从1933年3月至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不到2年的时间里,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先后有3位校长:任弼时、张闻天和李维汉。党校共分3个班:苏区工作人员训练班、党团苏维埃和工会训练班、高级干部训练班。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的课程,主要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党与政府各项建设的理论、经验以及工人运动等。不同班次课程不一样,

总计课程的科目达10余门之多,如党的建设、苏维埃建设、军事斗争理论与经验、工人运动、中共党史、西方革命史、历史、地理、自然科学常识等。学校教员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学校的领导和专职教员,如任弼时、张闻天、杨尚昆、董必武、李维汉、冯雪峰、成仿吾等,其中有人还讲1门课,如成仿吾就讲社会发展史和政治常识2门课。另一部分就是请中央首长讲课。毛泽东讲授苏维埃运动史,邓颖超讲授中共党史,陈云、刘少奇讲工人运动史,顾作霖讲少共史,博古讲联共党史,周恩来、朱德、刘伯承讲军事斗争等。

1933年3月13日下午1时,全体学员及各相关代表齐聚学校礼堂,举行了庄严的开学典礼。少共中央局、中央政府与全总执行局代表均有重要演说,勉励学员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最后由校长训词,学员答词后即宣布散会。

学校很快成立了中央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国家职工工会支部。学校学术活动也很活跃,开学伊始便于3月18日(巴黎公社纪念日)和4月9日

举办了2次演讲:主讲人分别是董必武和张闻天,主讲题目分别为:《巴黎公社》《中国苏维埃政权的现在与未来》。革命需要学习,学习促进革命。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所在的叶坪洋溪村位于瑞金城西郊,本是不起眼的小村落,而由于党在此,党校在此,人气士气文气兴盛一时。

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期间,虽然办学时间短,条件艰苦,学校还开始自编教材,这里举2本书为例:一是张闻天、毛泽东合著的《区乡苏维埃怎样工作》,由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出版;另一本是以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名义出版的《中国革命基本问题》。这2本教材的编写,反映出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不仅注重宣传马列主义,也开始关注中国革命的具体问题并注意提高干部的工作能力。

1934年10月,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开始长征。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的干部和少部分学员向西突围到于都,编入李维汉任司令员兼政委的中央第二纵队,夜渡贡江,开始了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这一历史阶段就自然结束了。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

为巩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支援革命战争,发展苏区经济,改善民众生活,1932年2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在瑞金叶坪宣告成立,第一任行长为毛泽民。其业务包括分行、支行、兑换处等。办理抵押、贷款、存款、票据买卖贴现、汇兑、发行钞票、代理国家金库,另外还发行革命公债及经济建设公债。还有一项代理国家金库的特殊使命。每逢部队有重大作战行动,国家银行都要派人一手拿算盘,一手拿枪,深入前线接收、押运战利品,筹集军费和战备物资。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成立之初,苏区各地并行流通的货币五花八门,单是各级苏维埃政府发行的纸币就多达150多种,还有布钞10余种。如有江西工农银行的铜元券、闽西工农银行的银元券、光洋、国民党的纸币,甚至还有清朝的铜板。金融市场杂乱无章,严重阻碍了商品流通和经济正常运行,统一货币、统一财政刻不容缓。1931年11月,在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民受命筹建国家银行,筹划印刷、发行国家货币,但临时中央政府既不提供场地,也不配备设施,只给了他五个编制。毛泽民知难而进,经过精挑细选确定了出纳、会计、记账和勤务等职员,随后又在叶坪村谢氏宗祠附近租借了一幢简易民房,几张桌子、几把算盘一摆,国家银行开始运转。与此同时,中央造币厂也在原江西苏维埃政府造币厂的基础上扩建成立,人员、机器陆续到位。1932年3月下旬,红一和红五军团组成的东路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克漳州城。毛泽民也率领没收征集委员会随军来到漳州。这次筹得的100万元现款,成为国家银行的第一笔大额资金。漳州距离厦门仅50多公里,红军占领漳州期间,银行从厦门采购回了一批货币印刷材料,苏维埃货币发行得以顺利展开。1932年6月和10月,国家银行分二期发行“革命战争公债”共180万元,次年又发行“经济建设公债”300万元,并从中拿出20万元设立储蓄基金,广泛吸纳社会闲散资金,用于支持工农业生产,促进对外贸易。公债的发行,充裕了根据地的财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旧址。杨友明 摄

政收入,直接支援了反“围剿”的革命战争,而且增加了生产贷款额,支持了根据地进出口贸易。

根据苏维埃国家银行先后制定和颁布的《定期放款暂行规定》《定期抵押放款暂行规定》等相关规章制度,银行的贷款对象涵盖农业、工业、粮食调剂、合作社、对外贸易等各个方面,不仅发展了苏区经济,也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活跃了苏区经济,改善了农工生活。

1932年7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首批国币正式开印,半年内印制伍分、壹角、贰角、伍角和壹圆5种纸币共65.61万元。此外,他们还把各级苏维埃政府保存和散落民间的金银铜器集中起来,铸造铜币、银币和银洋等硬通货,充实国库储备,方便对外交易。国家银行所发货币币值稳定,准备金充足,宣传解释工作得力,很快就赢得了社会各界的信任,他们纷纷交出旧币,兑换新币,中央苏区的货币和财政渐趋统一。国家银行和各分行所发行的纸币都属于兑现纸币,这些纸币可以与银元、银角自由兑换,例如苏维埃国家银行发行的一元券上面,就印有“凭票即

付银元一元”等字样。随着业务扩大和职能逐步齐全,国家银行总行机构于1932年冬天达到最大规模,行长之下设总务、业务两处,总务处下设文书科、券务科和管理科,业务处下设会计科、营业科和出纳科。在这期间,国家银行分别在福建、江西设立分行,在福建白砂、南阳,江西瑞金等地设立兑换处4个,在各县苏维埃政府、各红军经理机关设立了数十个兑换处。

1935年10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与原陕甘晋银行合并,将银行名称改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西北分行,时任中央财政部长林伯渠兼任行长,曹菊如任副行长,行址初设在瓦窑堡。1936年7月,随中共中央迁至保安;1937年1月,再迁至延安。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同年10月银行西北分行改名为陕甘宁边区银行,总行设在延安。至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在名义上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中国人民银行于2002年拨出专款,按原貌异地修复国家银行沙洲坝新屋家旧址,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史陈列馆。

阮啸仙是共和国历史上第一任中央审计委员会主任,是人民审计制度的奠基者。苏区群众中,至今还流传着许多阮啸仙秉公执法、清正廉洁的感人故事。

那是1933年10月的一天,阮啸仙从福建长汀来到瑞金沙洲坝。他刚在元太屋杨氏宗祠一间10平方米左右的小房间住下,就遇到了自己十分敬重的毛泽东主席。老战友久别重逢,心情非常激动。他们天南海北地聊起天来。群众见毛主席与一位白面书生亲切地拉家常,都纷纷围了过来。

“同志们,我给你们介绍一位我的老朋友。他是广东河源人,是广东著名的农民运动领袖。”这时,毛泽东呵呵一笑,“你们别看他是个白面书生,戴着一副近视眼镜,他可是专门为我们穷苦百姓说话办事的,我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时,就听到这样一首歌,‘阮啸仙,阮啸仙,农民见到哈哈笑,地主见到哇哇叫!’你们欢迎他吗?”

“欢迎!欢迎!”围观的群众哈哈大笑,异口同声发出热情的欢呼。

“过奖,过奖,其实我只是做了党分配给我应该做的工作。”阮啸仙向毛泽东和周围的群众鞠了一躬,然后深情地说,“谢谢毛主席的关心!谢谢苏区人民的信任!”杨氏宗祠里再次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

1934年1月,阮啸仙在出席“二苏大会”期间,提出了建立完善人民审计制度的建议。这一建议不仅得到与会代表一致拥护和坚决支持,而且引起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高度重视。阮啸仙在这次会上再次当选为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2月3日,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任命阮啸仙为中央审计委员会主任。

阮啸仙上任伊始,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健全各级审计组织,选派各级审计干部;按照法律规定,在省及中央直属县(市)设立审计分会,选备审计人员。阮啸仙对审计人员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提出了“六不准”工作纪律,即“不准偏听偏信;不准弄虚作假;不准漏查或使用概数;不准徇私用情;不准吃馆子或吃公饭,外出审核一律自带干粮;不准收受被审人员任何物品”,并要求审计人员熟记和坚决执行。他常说:“自古正人先正己,凡事必须以身作则,以身示范,这样才能树立起一种正气、硬劲,没有正气难以审查出问题,没有硬劲难以除弊。”

随后,他亲自起草的《审计条例》,由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审查通过并颁布实施,成为中华苏维埃政府第一部审计法规。审计职责明确后,阮啸仙从中央机关入手开展审计监督工作。经过10多天的努力,中央各部的财务情况基本搞清楚了。随后,他克服体弱多病的困难,带领审计人员对中央直属瑞金县、中央印刷厂、邮政总局、贸易总局、粮食调剂总局等单位进行了审计,查出了大量问题,追回了大量不合理的开支费用和贪污款项,贪污分子也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阮啸仙与中央分局书记项英、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陈毅、中央军委政治部主任贺昌等领导苏区军民坚持游击战争。1934年12月,阮啸仙奉命调任赣南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治委员。

1935年3月,根据中央二月指示精神和中央分局分九路突围的部署,阮啸仙和赣南省军区司令员蔡会文等率独立第六团和赣南省党政机关干部1800余人,从于都上坪山区出发,向安远、信丰方向突围。此时,安远和信丰驻有国民党粤军三个师和一个独立旅,装备精良,且在这一带筑有坚固碉堡,重兵防守。由于山高林密,敌人封锁十分严密,1800多人的队伍目标太大,容易被敌人发现,也不易展开与敌作战。为此,阮啸仙与蔡会文果断决定:“以连或两连为单位”“穿过敌人的封锁线到三南与河西去活动”。在阮啸仙等人的指挥下,部队急行军,并与敌人激战后,突破了国民党粤军在于都县马岭和赣县牛岭的封锁线。

3月6日,当部队突围至信丰安西上迳枫树庵上小埂时,阮啸仙不幸被敌人子弹击中,壮烈牺牲,年仅37岁。1935年4月,陈毅在信丰油山闻此噩耗,含痛写下一首感人肺腑的诗篇《哭阮啸仙、贺昌同志》。诗句中的“阮誉传岭表”“审计呕心血”,是对阮啸仙一生功绩的最好总结。



共和国历史上第一任中央审计委员会主任阮啸仙(资料图片)